特别关注·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从百年考古学看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

□ 高江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百年考古就“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这一重大问题建构与实证了什么？回顾以往，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出发，可以形成一些初步认识。

持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就中原地区而言，综合百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体在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的相关聚落中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该区域文明起源的开始，是各种文明要素起源并不断聚积的阶段。之后社会不断发展，历经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阶段，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如都邑性质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具有城址、等级墓地、铜器、礼器、宫殿及礼制建筑等齐备的文明要素。经过距今4000年以后新砦文化时期的国家形态的早期发展，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文明中心地位形成。后经商周时期的巩固与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华夏文明逐步走向辉煌。

长江下游地区至少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早期社会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新发现就反映了这一点，该地区自此开始迈入文明化的进程。崧泽文化之后该区域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等级分化不断加剧，历经距今5300年开始的良渚文化早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始，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都实证此时良渚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良渚文化晚期，文化日渐衰弱，社会结构和权力趋于分散，该地域的良渚社会逐渐走向衰亡，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社会复杂程度不高，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低谷。马桥文化之后，这一区域随着周人的南下而逐渐被纳入中原地区文明和国家一体发展的历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也是在大体距今6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末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肇始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后，进入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晚期时，聚落群至少形成了大、中、小三层的金字塔式布局结构；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大量出现、聚落群的复杂分化、山东泗水尹家城和临朐西朱封遗址超大型墓的发现等，表明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社会组织和结构复杂，王者雏形出现，礼制初步形成，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社会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海岱地区内的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也未出现像良渚社会一样绝对的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区域。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文化急剧衰退，商周时期海岱地区逐渐为商周文明所辐射控制。

红山文化在距今6700年左右出现于西辽河流域，延续发展到约距今5300年的晚期才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其文化末期社会分层加剧，进入文明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文明化进程是从距今6000多年的大溪文化中晚期开始的，而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该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和整个文化区的中心，然而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峰值期将要迈入文明社会门槛时却逐渐衰落了下来。之后中原文化逐渐南下，该区域进入夏商文明直接影响的发展阶段。近些年，在晋陕高原地区发现了距今4200~3800年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石峁城址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也应该进入了文明阶段，但其前身文化发展还有待探索，而之后石峁城址废弃，这一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中断，一些文明遗产在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互动交流中被吸收利用。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明化”的过程，虽然存在复杂多样、非单线的进化，甚至某些文明进程的“断裂”，但整体上仍是“螺旋式”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个别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彻底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吸收、融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

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些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良渚文明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显然与早于良渚同样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且相邻地区的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兴一废。此外，良渚文化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也是学界的共识。中原地区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更为明显，尤其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晋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时存在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重要因素。龙山时代的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乐器、建筑技术等各方面存在互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到了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这一点已成常识，不再赘述。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与多元，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的文明特质。

距今约5000年明确进入文明形态的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墓葬中满目祭祀礼神的玉璧、玉琮及繁缛复杂的神性纹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红山文化晚期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庙、坛、冢结合的宗教特征及其聚落结构，包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将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这种社会可以迅速积累财富与集中资源，实际上是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把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虚无缥缈的神灵之上，长期来看十分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距今4300多年，经历之前神性“务虚”的阵痛与冲击后，世俗的“务实”品质成为文化与社会的主流。这一点或许在更早些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表现出来，最能反映文化与社会务实特质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见宗教性大型建筑，却舍得耗费力量修建城池，“筑城造郭”，用于防御外敌入侵。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了具有系统“观象授时”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该建筑经过多年实测与研究，推测当时可以观测20个节气。所谓“观象授时”，授的是与物候密切相关的“农时”，主要用于指导当时的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支撑。显然，陶寺文化时期，重视农业生产就是最大的“务实”。陶寺社会集团的统治者们似乎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与经营相对较少，而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复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良渚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神人兽面纹之外的鸟纹及变体鸟纹应是源于大汶口文化，进入良渚社会后与神人兽面纹组合相融成一个整体。之后，进入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与社会扬弃式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因素，例如创造性使用范铸铜容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之始。日常用具也有经改造的情形，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更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而是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中华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模式

中华文明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复杂多样，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古老文明，难以用任何一个已有文明模式来概括与比附，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突出标志。他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主要形式。就百年中国考古实际而言，这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以适合中华文明的内涵。目前已知进入了文明时期的陶寺社会既有“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也有“平民和贵族斗争”。而依据属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考古材料，二里头社会显然既有内部阶级对立，又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还有明显的对外扩张，至少是此三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

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中华文明起源归结为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基本形式，这就是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一种探索，而且似乎与恩格斯所言三种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李伯谦撰写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两种模式”，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和夏商周军权—王权国家模式。目前比较清晰的神权模式为良渚古国，王权模式有陶寺、二里头乃至商周王朝。

文明呈现的模式与文明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密切相关。关于文明的形成内因，国外学术界曾有过冲突论、融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还涉及人口增加、农业强化、交换贸易、战争、环境、资源、技术等众多因素。中华文明的形成显然复杂得多，众多因素几乎是兼而有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严文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

理论与思考源于实际材料。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中国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也有“陶寺模式”“石峁模式”等。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轨迹和最终结果来看，这些“多元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龙山时代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或中断，其文明化的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开始向周围地区广泛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各地逐渐融入了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总之，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宏观上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在其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展现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多元一体等特质与风格，这些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和宝贵财富。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而言，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创新、发展是高度文化自信的“基因”。无论是炎黄传说，还是尧、舜、禹、夏、商、周之早期中国，文化基因从未中断，祖先认同绵延至今，就此而言，“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史學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

全球史视野下中俄茶叶之路的变迁

□ 李灵玢

17至20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通欧亚大陆的又一贸易通道，但以往讨论多限于对中俄茶叶贸易和路线的线性描述，而忽视了它们发生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范围内，即全球史的时空范围：东西方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茶叶的流动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结果便体现为茶路的变迁。笔者尝试将中俄茶叶之路的演变历程，放置于全球时空的变化之中，考察其变迁的全球因素及多重影响。

从茶路变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契合点来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信息与动态

山西省高平市新发现一处宋金时期木构古建筑

□ 徐怡涛

近期，山西省高平市有关部门接到泽州中学教师和民间古建爱好者的通报，称该市神农镇中村圆融寺尚存金代木构建筑，并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教研室予以学术鉴定。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迅速响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课题组赴现场调研，开展了文献史料收集、建筑形制记录、三维扫描、航拍、访谈、木样采集等多维度的全面调查研究工作。

高平中村圆融寺现存一进院落，其格局构成为：门殿，后殿（三间，已塌），后殿两侧东、西朵殿（各三间，东朵殿清乾隆时扩建为春秋楼，东、西朵殿均部分坍塌），东、西配殿（各五间，西配殿已不存）。圆融寺现存最古老且最完整的建筑为门殿，其主要形制为：面阔小三间，进深六椽，厅堂造，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七等材，屋顶原为歇山顶，后改悬山顶。外檐斗栱被包砌于砖墙内，从前檐和转角铺作露出砖墙的部分形制分析，圆融寺门殿外檐斗栱为五铺作，昂状耍头，补间铺作耍头后尾里转做挑斡，扶壁栱为泥道单栱承方，方上影刻慢栱再承素方。其斗栱上的琴面昂、横栱抹斜、翼形栱等形制，符合晋东南金代中后期的时代特点。但经全面考察后，研究团队发现，圆融寺并非单纯的金代建筑，其内部梁架仍存在北宋建筑构件，如殿内部分角梁和驼峰之上，尚存六朵斗凹下撇出锋的栌斗，此形制为晋东南地区北宋中后期的典型形制，且不见于金代。又如，四椽栿对接乳栿，底皮相平、大叉手抵襻间方、四椽栿加工方正等皆为北宋常见的梁架形制。综合现场建筑形制与文献史料判断，中村圆融寺门殿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檐下斗栱被全部更换，但仍保留了部分宋代构架，其后，明清重修时，屋顶瓦作被全面更换，屋顶形式亦由歇山改为悬山，并包砌四面砖墙。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生产大队将其用作粮库，圆融寺门殿得以保存至今。在调研的基础上，北大团队还提出了近期保护建议。未来，团队将继续深入开展其历史价值和建筑考古研究，为中村圆融寺的修缮和利用奠定学术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平中村圆融寺门殿的发现和价值确认，不仅增添了一处珍贵的宋金木构古建筑遗存，更重要的是，其发现和价值确认过程，体现了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密切协作。这充分说明，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文物保护和价值认知的自觉与合力，我国的文化遗产必将得到更好、更全面的保护，文化遗产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